

2108

第八輯

廣元市文史資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广元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委员会 编



广元市文史资料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广元市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政协广元市第三届文史资料 编辑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 编：曾子益

副 主 编：解大德 周承瞻

顾 问：彭 钺 苏仲威

编 委：唐文远 徐守银 江必鹏

陶锦春 张立仁 梁秀英

目 录

八年抗战回忆.....	朱长昭	(1)
我在国民党部队中抗战八年.....	曾前程口述 黄祺整理	(10)
忆抗日时期青川的救亡工作.....	胡际春	(20)
剑阁人民支援抗日战争纪实.....	王守义	(26)
广旺矿区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郭家仁	(33)
抗日时期的群众文化活动.....	连化夷	(44)
八年抗战散记.....	董长新	(57)
旺苍人民对抗战的贡献.....	石惠修	(65)
忆抗战期间日机袭川.....	明 香	(68)
抗战史料二则.....	漆守银	(80)
抗日战争阵亡将领挽联选.....	魏良文搜集	(88)
抗日战争始末资料.....	石惠修	(93)

川北明珠放异彩.....	李定凡	(114)
我在核工业八二一厂工作的二十五年.....	张国平	(125)
广元税务事业发展概述.....	王永树	(134)
广元水利史略.....	吴文培	(139)
广元乡镇丝绸企业的兴起与发展.....	张略升	(152)
旺苍蚕业史话.....	杨荣生	(160)
广元肉类联合加工厂建设始末.....	张文第	(167)
青川核桃产销述略.....	张金和	(185)

漫话广元市境内的钱币·····	魏育才	(195)
民国时期广元的金融·····	魏良义	(200)
苍溪县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前后·····	杨辅周	(219)
旺苍的大炼钢铁运动·····	闵长兴	(239)
大炼钢铁亲历记·····	魏绍卓	(259)
剑阁解放初期的征粮工作·····	龚大楚	(267)
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史上光辉的一页·····	范厚坤	(272)
宗教界爱国人士马万全·····	枫 叶	(276)
回族的风俗习惯·····	马万全	(282)
青川回族人民的习俗·····	马光藻	(292)
川北佛教圣地觉苑寺·····	王守义	(296)
回民圣地青川彝溪拱北·····	李愷吾	(308)
平乐寺佛教旅游区开发散记·····	王扬声	(311)
行香会与盘道·····	王炎生	(324)
魂牵梦系六十年·····	何广华 石素英 王艳科	(331)
往事拾零·····	贾明钧	(343)
广元同善社·····	熊正兴	(348)
川北长联高手张鹏初·····	张毅朴搜集	(352)

八年抗战回忆

朱长昭

抗日战争爆发时期，正是我的孩提时代。日寇的铁蹄侵略到我的家乡时，我刚刚九岁，无情的战火袭击了我黄金般的童年。从此，我便忍痛告别了可爱的家乡跟随着父母兄嫂以及成千上万的难民开始了逃难的生涯。

我曾当了八年的难童。从安徽逃出来，经过了河南、湖北、陕西到达四川，在艰涩的逃难历程中，渡过了多少个令人难熬的日日夜夜啊！时隔五十多个春秋，如今我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但历历往事，脑海翻影，略述二三，以抒旧怀。

家乡沦陷的情景

我们逃难来川的难民，自从日寇占领家乡就一直奔往后方，所以很想知道家乡特别是日寇占领后的情况。对于这，后来我曾听见难民中一些当时在沦陷区目睹过日寇横行的人摆谈过，其中印象最深的，一个是我的岳父曹锡文，他是安徽凤阳人；一个是安徽涡阳的杨仕云，一个是河南信阳的苏振华三人了。

岳父曹锡文是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的冬天，战火逼近了家乡时带领全家外逃的。当时他还舍不得一下子逃远了，开初只逃到离家二十多里路的地方，想看看形势如何并决定是否逃远？两天之后，日寇便占领了家乡，这时候别的人家都纷纷逃往

后方去了，他仍守护着全家人暂时躲在近处不愿走。又过了两天，因为出来时带的口粮已经吃完，全家人要饿肚子了，他竟然冒着险偷偷地在夜间一个人跑回家去，家里已经住进了日本兵，他连夜又溜到他一个叔叔家去住宿，第二天白天没敢出来，夜里才偷偷地跑出来，全家人都提心吊胆地盼望着他，担心他会出事的，到了小晌午，见他跑得满头大汗，还挑了一担高粱米来，一家人都惊喜万分！

他回来后，向家里人叙述了回家去的情况真够怕人的。日军占领后，首先是把当地的保、甲长们喊到一起，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先给降服了，继而叫他们要忠于皇军，替皇军办事。这下子，保、甲长们便挨家挨户传达日寇的“安民政策”，不准违反皇军的戒令，个个要做皇军的顺民，这样，就能得到皇军的保护，也不致受到惩罚，否则，就要受到严厉惩处。这是当晚岳父的叔叔给他讲述的，这个叔叔当时是个甲长，被迫着替皇军跑路办事的。他说，日军进村后，一是挨户搜查和清理有没有我军的残余人员和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人员；二是派粮派夫；三是恢复市场上的秩序，仍然要各守旧业。但是村民们都是恐惧万分，每天眼见日军一队一队的到处巡逻，人人提心吊胆，所以占领后仍不免有不少人偷偷地逃出来的。不幸的是如果被敌人发现而没有逃掉的抓回去就不得活命，立即召开大会告诫村民后当场击毙。最令人可恨的是有时候日寇偏要叫我们的村人自己人来打，结果有的人无可奈何地用棍棒打，用鞭子抽，而有的人竟下不了手而反被打死的时有其人。

杨仕云和苏振华二人是在日寇侵占后的第二年（即1939年）逃出来的，因为他们曾直接当了一年多日本皇军的“臣民”，所以亲历和目睹过日寇的种种罪行，后来，他给我们同乡们叙述这段经历时，惹得大家一阵仇恨心情油然而生，久久难以平静。

日寇占领后的日子真够难熬的，一是整天帮他们干活，挖坑

道，筑战壕，运军火，送粮食，凡是粗壮的男丁，全部抽出来，家里只剩下老人，小孩和妇女了，二是年轻的妇女都被抓了去，编成敌后服务队，有的做保育，有的做杂役，而有的竟专门用来伺候日寇军官和私人生活，其中竟连十几岁的小女孩子也不能幸免，有的受不了日寇畜性蹂躏和摧残而自杀，有的趁空逃跑，而跑不掉被逮回来的就更遇殃了，敌人便把他们送给士兵们集体轮奸，象这一类妇女中最后致死的最多，这是日寇侵华永远不能饶恕的血腥罪行。

在日伪区儿童们被迫着去接受他们的“感化教育”，原来的小学堂校长、教师都撤换了，由一部分汉奸和日寇中“中国通”来任教，课本也用日伪方编排、出版的，开始还用汉文，慢慢地就学起日文，唱起东洋歌来了，要我们的孩子都得规规矩矩地听他们的话，受他们的训。学堂不准一个孩子缺课和逃学，否则就被弄来狠狠地鞭打，吓得孩子整天胆战心惊地去上学，晚上放学回家抱着大人就哭。

提起日本侵占后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以上所述的只是其中的几件事实，但已不难看出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同时也说明当亡国奴是无比悲惨的。所以，在沦陷区里的人们，没有一个不痛恨小日本的，只要一有机会，不是想法报复，就是想法逃出魔窟，真心愿做日寇顺民的只是一小撮丧失国民本性的汉奸走狗而已。

在 西 安 的 难 童 学 校

1938年秋，我们全家七口人随同难民队伍逃难到西安，初到时，政府收容部门把我们安置在陕西会馆内，因为当时抗日前线国军的节节败退，安徽、河南先后失守，武汉又告吃紧，逃难的人群蜂拥北上，西安人口爆满，政府对逃难的民众又不能不管，

于是市内的一些戏院、会馆、货栈、学校、教堂、澡堂、舞厅以及寺庙都迫令关停，用来收容难民。我们这一支安徽、河南的难民分成几股，先后在陕西会馆，共和戏院两处，每天由收容站供给两顿吃不饱的饭食，但儿童却受到优待，除了两顿饭额外每天中午发给一个馒头。这在当时我们逃难的艰苦生活中算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了。

我那时已有九岁，正是学龄儿童，但由于家乡沦陷随着大人惶惶逃命出来，能够免遇日寇的屠杀和炸弹炸死而活命就算万幸，哪里还想到去读书呢？谁知没几天，管理员竟到难民中逐个清查，凡是七岁以上的儿童均要带到难童学校去读书，这是万万想不到的事。父亲首先非常高兴，但母亲却不让我去。她说我们一家老小从家乡逃难出来始终是守在一起的，现在兵荒马乱让一个最小的孩子离开她身边，她委实放心不下。后来经过管理人员反复解释，说明让儿童去读书，这是政府采取的“抗日救国”的总纲措施，虽然中国遇到日本侵略，但我们仍不放弃对下一代的教育，让儿童在困难中仍然有读书的机会，这是一件好事，而且又不会让孩子和家人分散，又何必担心呢？之后，母亲才勉强地让我离开她。于是，第二天我便和好几十个孩子由管理员一同带到了儿童学校。

难童学校在西大街的一处校园里，这是一所很大的校园，里面设有幼稚园，教室也多，娱乐设施齐全，环境优美，我们入校后，好象进了一所大花园，与难民所相比，简直换了人间似的。

和我们一批同时入校的有三百多个儿童，共占了六间教室，刚进校就被一批女老师热情地接待着，原来他们都是从东北、华东、华北一些大学里转移来的爱国青年，其中也有小学教师，虽然都是些年轻的大姐姐，但却好象母亲般地对待我们，带我们去洗澡，替我们搓擦身上的污垢，帮我们理头发，剪指甲，换洗了

一身干净的衣服，之后开始给我们上课。

课程主要是讲我们的中华民族、我们的祖国、关于日本侵略者，怎样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等内容，另外还教我们学语文和算术。使我记忆最深的是他们在课堂上讲到日寇侵华、蹂躏同胞，团结起来，抗日救国时，讲得来愤慨激昂，有声有色，有时愤怒，有时悲哀，有时举拳击案，有时执巾拭泪，我们虽然年幼，但却都很懂事，又是亲身遭受到国难带来痛苦的孩子，所以，随着老师讲课的感情，起伏回荡，接着在老师的指挥下，一齐高唱“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在一曲整齐、高亢、悲愤、雄壮的救亡歌声中下了课。

我们在这所难童学校里共度了不到三个月的美好时光，就被万恶的日寇侵略的火焰逼近西安而结束。它虽然是短期的学习生活，但给我们流亡的儿童培育了深厚的爱国心理，事隔五十年后的今天，那段欢快、幸福但却多么短暂的追旧情怀，不时涌上心头，许久难以平静。

防 空 洞 一 瞥

1938年，正是日寇疯狂侵华的高潮。在后方，只要是稍大一点的城市，都不能幸免日本飞机的轰炸。我们所经过的如汉口、西安这些大城市更不例外。大城市数十上百万人口聚集的地方，躲避敌机的轰炸，就只靠地下防空洞。防空洞是一条地下挖筑的通道，一般只有一尺多高，但却能容纳几百上千人。当敌机出动后，防空部门专门负责发出警报信号——预备警报，当敌机正在袭击邻近地区或已朝向本地区方向袭来时，即发出紧急警报信号。只要听到预备警报的信号后，人们即惊慌不堪，纷纷逃避，条件好的即朝市郊疏散，但大多数市民只有钻进防空洞。

防空洞内只有那么大的容身之处，进去之后，人挨着人，你

挤我撞，混成一团。有的一家人老人、小孩、妇女挤散了，你找我，我找你，哭的，喊叫的，很久都无法平静。只有紧急警报的笛声响了，洞内就会一下鸦雀无声。因为这时候大家都知道，敌机满载着炸弹即将在我们头顶上抛掷下来，也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所以人人都正襟危坐，再顾不上去想其它什么了。

在防空洞里一般还是比较安全的。除了有时争着抢着入洞有踩伤人的现象之外，都能够避免敌机轰炸的危险。所以在警报发出之后的紧张而恐惧的心情，只要一进入防空洞，大家坐在一块时，就会感到轻松了好多。只是那些富达贵们在洞中尚悬念万贯家产而难以安宁。而我们难民们则只在保住性命，身外无物，倒是能安心坐在洞中。

但是，空袭的时间就不知道长短了。一般的防空时间最短的也需要三、四个钟头，而最长的竟达到一整天。因此，躲警报必须带上充饥的食物。防空洞里真是又一个天地。在平时，尽管人们的关系不同，但在防空洞里是同舟共济，却能产生同病相怜的感情。这里没有贫贱之分，地位之分，看到来不及带食物的人挨饿，就有人把自己带来的食物分给他，看到没有妈妈的婴儿啼哭，就有别的母亲给喂奶，看到有人生病就主动把自己带来的药物拿出来，真象一个互相关心，互相照顾的团结和睦的大家庭。

那时候，由于经常在防空洞一起躲警报而熟识，成了非常好的朋友的，比至亲的关系还要好。

在防空洞里躲警报比较安全，一般确是能幸免敌机的轰炸而活命。但是它也有不安全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在朝汉正街顶端方向的一处防空洞，竟遭到敌机投掷的重弹炸塌了一大段，当即炸死了一百多人，解除警报后我们才知道，当时我们没顾得去看现场。第二天，等我们去看来时，那种情景和惨状，实在目不忍睹！有的人幸免炸死但已无法爬起来，已经挖出来的尸体横七竖八地

堆了一大堆，有的被炸死的人已经无法掏出来，象是被活埋一般。

在这次劫难之后，我们虽然还继续去防空洞躲警报，却已经不像往常那样放心了，总是捏着一把汗，担心不知哪一回也会轮到 we 被“活埋”掉。

租界防空最保险

我们住在汉口市的汉正街第七难民所里，那时正是日本飞机疯狂轰炸后方的时期。象汉口这样的大都市，正是日寇轰炸，破坏的重点所在，差不多一个星期要跑几次警报，弄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开始遇着警报，我们随着市民一起去躲防空洞，但是防空洞也不是完全无恙的地方，还得想出别的更可靠的办法才好。后来，终于被找出了一条躲警报的好路子，就是去投奔外国租界。租界是一些外国人在中国租用的地界，用来作为领事、经营商业和其业务的地方，在那里修建了房屋，设置了办事的管理机构，里面进驻了外国派来的官员和办事人员。当时汉口市我记得有英、美、日、法等好几个国家的租界，每个租界的四周拥有该国的国旗为标志，在他的租界范围内，不受任何侵犯，得到了特殊的保护。因此，我们难民中一部分人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在每次空袭警报时就往这些外国租界的地界跟前跑。我们第七难民所设在汉正街，离英国租界比较近，所以就一直跑到那里去躲警报，直躲到解除警报，总是安全无恙。开始，我们总想进入租界里面去躲避空袭，但是，他们的门警全副武装，守卫大门两旁，见我们来了，老远就叫喊着：“走开！走开！”所以，根本就进不去。后来，我们找汉口的难民总所请愿，要求他们通过领事，从救护难民的特殊请求出发，他们竟然同意我们难民进去躲警报。于是，难民所还专门造了名册，固定了每次进入租界躲警报

的人员，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袖套，作为特殊标记。从此以后，我们对警报就不太惊慌了。

有一次，我们在英国租界躲警报，日机轰炸了对面的实业大厦，因为离租界很近，震动得租界玻窗作响，这下可不得了了，事后听说英租界向日方提出了抗议的照会，弄得日本使馆还专门向英使馆道了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这次事件之后，我们对租界期望更大了，躲警报不再进防空洞，径直向英国租界里去躲，因为租界防空最安全、最保险。

在 剑 阁 的 难 童 学 校

1940年春，我们逃难来川留住剑阁的第二年，由剑阁难民站会同我们难民代表共同决定，为了使逃难而失学的儿童能够读得书，自己动手开办了一所难童学校，凡是难民中的儿童都可以入校读书。这是我们继在西安之后的第二次就读的难童学校。

校址设在卧龙山下原来的母家祠堂里，校长是难民中的王玉山先生，教员有难民站的小胡干事，站长的太太刘××和王玉山的义子杨子芹，另外还邀请了剑阁师范学校的两个学生作为临时讲课的老师。课程内容按当时一般小学的课本安排的，有语文、算术、公民、历史、音乐、体育等科，简直象一所正规的小学校。

我们入校的儿童共有五十多个，年龄大的有十六、七岁，我当时才十一岁，算是比较小的学生，但成绩是全班的第一，所以，从校长，老师到学生都对我特别的好。

上课的老师中，使我印象最深的要算难民站长、干事和王玉山的义子杨子芹三人了。这是因为难民站的小胡干事给我们上公民课，他结合当时“抗日救国”的时势，凭着他那一股爱国热忱，有时讲得我们听入了神，虽然到了下课的时候，都还不愿下

课。杨子芹给我们上体育课，除了课堂上讲体育知识外，还把我们领出课堂学体操，打球和组织赛跑，跳高、跳远，搞得非常活跃。唯有胡站长给我们讲语文课，讲得很糟糕，他只是照着书本念，又不分析课文，也不解释词语，有时我们请他解释一下词语，他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惹得下面的学生有的竟然失声地哭起来，弄得地很尴尬。

由于学生住地分散，学校又无法解决食宿，所以每天从上午九点开课，下午六点放学，中午休息让学生回家吃顿午饭。我们当时住在三江口的观音庙，离校最远，只好每天自带一顿干粮，中午不回家吃饭。

最难忘的是，每天下午放学之后，难民站的小胡干事，总要亲自护送我们回家，有时我们不过意，都劝他不要送了，他说：

“因为你们住的最远，要走一段很长的路，又走的河边，还要过一道河，年纪又小，我不放心你们，还是送送的好。”所以，除了他有什么特殊事没有来学校之外，从来没有间断过护送我们路远的学生回家。

从1940年3月到10月，我们在这所难童学校里一共学习了近八个月时间，中间没有放过暑假，老师和同学们始终如一地度过那段愉快的学习生活。我们几十个难童在此学得了不少的知识，家长们都感到满意，因此，在学校结束的时候，难民代表们还专门办了一次金州师会，以表示对校长、老师为教育难童付出的辛劳深切感谢。

作者原系剑阁县建筑公司办公室主任，现已退休。曾为剑阁县政协撰写史料多篇。

我在国民党部队中抗战八年

曾前程口述 黄禔记录整理

我是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上马房的农民。小时给地主当放牛娃，一字不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红军长征路过家乡，父亲曾显壁做了苏维埃分会主席。红军北上后，我们全家都遭了殃。1937年沪沟桥事变时我十八岁，当时村里农民白培荣和袍哥大爷张金山的儿子打架，我为白培荣打帮捶，打赢了。张金山告到骑马区区政府，区长李成周要抓我问罪。吓得我丢下刚结婚的妻子，跑到青川县白水镇，腰无半文，饿得头昏眼花，睡在街头。听说广元的部队很多，我想投奔到部队去，不管死活，总有碗饭吃。我走了几天的山路来到广元城里，向街上的“兵兵”打听，说是邓锡侯的部队奉命去打石家庄要招兵买马。我即随小兵们来到邓锡侯安营扎寨之处要求收我入伍，不论干啥都行，只要有碗饭吃。他们当即收下了我，安在邓锡侯属部第45军127师381旅761团第三营第八连二排六班。班长名祝玉福，付班长方吉祥。

第二天天麻麻亮就出发，径朝天，过汉中到褒城直上奉县抵达宝鸡，全是步行。在宝鸡候车一天，半夜上火车到西安。停下来不到一天，又挤上火车来到潼关渡口，以小木船渡人过河，一般只能坐十几个人，三天三夜才把我们全部渡完。在风陵渡又上火车，是小火车，铁轨路仅两尺宽。在小火车上挤了七天七夜，才到达山西太原后面的榆次县，在那里整修待命。当时石家庄已被日寇占领。几天后，我集团军在太原前面的阳曲关和日军接上

了火线，刺刀、马刀一阵砍杀，败了下来。防守太原的国军，也和日寇接上了火，打了一天无济于事，太原吃紧，电令我部队增援太原。我们的部队占领了榆次县的东烈村。日寇攻势凶猛，我们抵挡不住，退到西烈村。谁知西烈村已出现了少数日寇。

天麻麻亮，一个士兵出去解便，日寇的子弹击中了他，当即身亡。接着营部门口的卫兵也被日寇骑兵击毙。营部不敢和日军短兵相接，忙把部队拉去西烈村。我们一路小跑，日寇的子弹飞到我们队列里，三三两两不幸中弹。日军逼进我们，我们在榆次县周围和日本军激战了三天三夜。我当了机枪手，初生牛犊不怕虎，机枪在手中“达达达”地响个不停，再也顾不上去想生与死的事。到了弹尽粮缺的关键时刻，退到乌木庄，得到八路军的增援。八路军作战勇猛，日寇不敢穷追我们，我们才得到安全地撤退到山西省洪桐县。师部驻洪桐县城，我营守师部，其他兵力占守山西省汾西县。待命一日后，电悉刘湘的兵力在南京上海一带被日寇打得节节败退，令我师部增援南京上海。我们在陕西边的潼关渡河，三天后乘火车到南京，接着急行军到江苏徐州待命。那时正是1938年元旦，在徐州打了一次押奈吃肉喝酒，发了七元钱的薪水，三毛五分钱的草鞋钱。接着到张国涛的老家中正口候令。

不久，来到山东省临城，在那里过了大年三十。三月初奉命开往山东滕县，我们四个师在两夹店，牛头山，马鞍山、黄山等处拉了一个长长的战线，和日寇交锋几天，一个师长在滕县牺牲了，王明章师长、陈敬栓师长还有一个姓曾的师长负伤。上面指派陈书龙师长代理军长。残兵败将，人人怕死，作战不力，处处吃败仗。

我所在的第三营在马鞍山被日寇围困。我不顾死活猛打机枪，直到天黑了才突围到平坝。在黑夜里，团长陈林，营长罗泽松打起电筒细看地图，忙下令叫我们立即向日军的后面方向跑步

撤退了二十多里才暂时脱险。

早上八九点钟来到一个村庄，忙着煮早饭，大家狼吞虎咽地把饭倒下肚皮里。不一会，日寇的三辆坦克横冲直撞而来，数十骑骑兵，挥着马刀“呼啦啦”地杀声振天。我们部队不敢迎战，纷纷夺路而逃。只有我和机枪连的几个士兵向日寇连连投掷手榴弹，我忙开动机枪一阵猛射。日寇的坦克和骑兵转身而逃。

我们脱险后，到山东临城，大家饥不堪忍，正搭锅煮饭，日军的炮弹连连落在营部的房顶上。情况十分危急，饭也不煮了，逃命要紧。我们刚退到山东的韩庄，正要继续后撤，碰上滇黔军（云南，贵州的部队）来增援。后来，我团过了运河，分守在运河沿岸，离台儿庄仅五六十里。前面的部队在临城，枣庄、台儿庄一带拉成长长的战线。听说蒋介石有指示，要集中一百二十个师在台儿庄汇战。我们7161团在运河两边守了七天。我所在的连队守运河上的两道浮桥。沿河两岸，每隔两三公尺就有一磅大炮。大炮很大，每磅都得八匹或十二匹骡子拉。八发式的机枪也有很多。后来不知为什么，台儿庄正在和日寇激战，并未正式通知撤退，炮队就拉走了。当时飞机在头上“嗡嗡”地飞个不停，连长告诉我们，说是苏联拉来了数门新式大炮，还有各种枪支弹药来支援中国打日本帝国主义。有一天，我们亲眼看见日寇的十几架坦克被苏联的火炮打翻。日寇不敢恋战，退避在微山湖的一个大岛上。

过了一段时间，日军在微山湖的大岛上养精蓄锐，一切准备充分后，又以象皮船登陆，企图从安徽的黄口县占领砀山。第一次登陆被我们击退，第二次登陆，又被我们击退。第三次登陆我们力量逐渐薄弱，抵挡不住，日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山东砀山，把我们师团团包围。我们三天三夜未煮饭吃，到处抓食物充饥。好不容易退到安徽姜庄。当时九个师战区的总司令是李宗仁，四十五集团军的司令是41军的军长孙正。我们退到姜庄才敢